



## 论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定位

<http://www.firstlight.cn> 2010-04-21

中国社会正处于前所未有的转型时期这是每一个普通中国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生存而亲身感受到的、不容置疑的现实。这表明，缠绕我们民族百余年的现代化进程终于开始从理论层面切入现实层面。中国社会正在以市场经济的建构为中介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中国民众正从传统深处走出来，与新的生存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会面，从而由传统的自在自发的活动主体向现代的由自觉的活动主体转型。

中国的发展哲学现代化理论理所当然地在这一深刻社会转型所造成的思维空间中生起来，成为近年中国哲学界势头正劲的理论热点。尽管不同研究者的视角和切入点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发展理论的宗旨是使中国社会真正获得现代性或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以科学和民主为内涵的理性化与以自由和平等为内涵的个体化。然而，中国的发展哲学或许命定要任重道远，它面前的任务决非如此简单与明了。实际上，以理性化和个体化为本质内涵的现代性迄今并未成为转型期中国社会普遍认同和自觉追求的主导价值目标。相反，无论在市场经济模式的选择与建构方面，在社会运作与管理机制的改革方面还是在社会文化价值的转型和个体生存模式的重塑方面，都出现传统与现代相互掣肘、相互纠缠、相互反对又奇特共生的现象。这使得中国的现代化和社会转型从其开始就表现为一个乏力的进程，而缺少一种义无反顾、志在必得的态势。面对这种情形，中国发展哲学的视野和中国社会转型的前景同时也变得模糊和扑朔迷离。

上述情形的出现，自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如中国社会农业文明的悠久、传统文化的顽强、闭关锁国状态的长久、自在的生存模式的惰性、宗法血缘关系的延续，等等。然而，这些原因或因素能够以如此强有力的方式干扰或阻滞中国的现代化和社会转型，则源于一个更为根本的现实中国现代化和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定位。要理解中国的社会转型和建构中国的发展哲学，都不能不从一个特殊的历史定位出发。

所谓中国社会转型和现代化的特殊历史定位是指这样一个现实中国的现代化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有一个很大的时代落差，即我们不是在西方工业文明方兴未艾、朝气蓬勃之际来实现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而是在西方工业文明已经高度发达，以至于出现自身的弊端和危机，并开始受到批判和责难而后工业文明过渡之时才开始向工业文明过渡的。不可否认，在此之前，其他一些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也在某种程度上受这种特殊的历史定位的影响。然而，没有哪个民族像我们这样强烈地体验了这一巨大的时代落差。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尚不能在毫无争议的情形下谈论后工业文明或后现代文化。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些趋向的出现表明，原本意义上的工业文明或现代化已出现了严重的弊端和危机，它必然要进行一种新的变革或调整。这即是说，当中国社会终于确立了现代化目标时，它所面对的现代性已不再是无可争议的价值象征，而是一个开始残缺的价值实体。这种特殊的境况使中国的现代化既不可能是美国等发达国家所经历的原发性现代化，也不可能是拉美国家所经历的“依附--发展”的殖民性现代化。

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定位直接影响到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发展，而最为根本的一点在于，它使得中国社会在短时期内无法形成一种支撑现代化进程的相对统一的、主导性的人文精神。而这样一种人文精神对于社会转型之不可替代的价值是无须费力证明的，正如著名社会学家韦伯所断言的那样，在每个民族的每一项重大事业的背后，总是存在着某种决定这项事业成败、与特定时代和特定社会文化背景直接相关联的时代精神力量。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人文精神“空场”至少表现在以下两个基本层面。

### （一）精英层面的人文精神的冲突与分裂

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定位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冲突和文化碰撞，它使得原本应以历时的形态依次更替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及其基本的文化精神在中国的擅变和演进，由于中国置身于开放的世界体系之中而转化为共时的存在形态，不同的文化精神同时挤压着中华民族结果不但普通民众面对文化的冲突无所适从即使知识精英也由于对不同文化精神的利弊的不同理解而相互分裂。在这种情形中，以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为内涵的工业文明精神并未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主导性人文精神，相反，以“天人合一”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消解现代性的后现代文化正通过某些知识精英而与工业文明精神形错综复杂的冲突。

一方面，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历史定位及其文化冲突使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之间的张力在现代化初始就过早地展开，由此导致了道德尺度与历史尺度的冲突。在西方走向工业文明的现代化进程中，技术理性与人本精神在相当的历史时期并没有展现出内在的张力，它们相互一致，构成了以理性至上、人性至善为核心的技术理性主义文化精神，从而极大地刺激和推动了人对自然的理性把握和技术征服尽管按照道德的尺度来衡量，这种文化精神在工业文明后期曾导致了人的异化、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等消极后果，但从历史的尺度看，这种文化精神则在一定时期内支撑着工业文明以极强的内驱力向前发展。而中国现代化进程从开始就出现了技术理性与人本精神的张力，出现了道德尺度和历史尺度的冲突。这种情形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中国社会减少或消除技术理性

过分发达所带来的技术世界的异化和人与自然的分裂，但的确存在着由于拒斥工业文明精神而干扰和延缓现代化进程的危险。

另一方面，中国现代化的特殊历史定位及其文化冲突还有可能从文化精神上导致后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奇特联姻，从而出现价值取向或发展尺度上的消极的时代错位。不可否认，以儒家和道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很早就通过直观的方式比较深刻地体悟到人和自然相统一的精神，这对于工业文明条件下面临着人与自然的分裂之历史困境的人类确实可以提供某种有益的启示。但是，必须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对人与自然相统一的观念的强调只是对原始的、未分化的、自在的“天人合一”关系的体悟，它根本无法与后工业文明时期人们基于人和自然分化之后形成的人与自然相统一的文化精神同日而语。因此，当新儒学试图直接从中国传统文化“内圣”开出民主、科学的新“外王”，当人们试图直接以儒家伦理建构起现代化的工业文明或者当人们把“消解主体”、“解构主体”的后现代文化精神与传统农业文明的文化精神直接联姻时，其结果很可能导致中国现代化“以过去为定向”的时代错误，从而断送现代化前程。

## （二）大众层面的文化价值的游离与裂变

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定位及其文化冲突不仅造成了精英层面的自觉的人文精神的冲突，而且也导致了大众层面的自在的文化价值的裂变。今天中国大众的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和宽容度，多元的需求、多元的生存样法、多元的价值观念不再被限制与禁止，而是被默许、宽容，甚至鼓励。在这种氛围中，当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工业文明精神和后工业文化精神通过新的生存方式而渗入或涌入人们的生活世界中时，中国民众的文化价值世界开始发生冲突与裂变，出现了新旧交织、传统与现代混杂的格局。虽然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洗中，工业文明的人本精神和理性开始为一些现代主体所认可，但它们绝没有在大众中构成一种具有崇高价值和巨大感召力的主导性价值取向。传统农业文明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模式依旧以中国特有的宗法、血缘、情感、人情等自在文化因素为基础而附着于大多数中国民众身上。不仅如此，后现代的文化心态也似乎通过大众文化、通俗文艺、文化快餐等，作为日常生活的添加剂而悄悄地超前地进入中国民众的生活之中。在今日中国民众的生活世界中，可以看到各种时代的价值观念在冲突、碰撞、游荡大众层面的文化价值的裂变状态似乎不会是一种很短暂的现象因为今日的中国社会已。没有一种机制可以直接有效地主导大众层面的文化价值流向。昔日社会的意识形态通过政治宣传和知识分子的精英话语的阐释而转化为大众话语，从而控制着大众的主导价值取向。目前，人文精神不但自身经历着冲突和分裂，而且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人文科学在社会中的地位开始趋向于边缘化，结果精英语言在大众的生活世界中开始失效，大众话语和大众文化价值开始游离出来，取得了某种独立性和自律性。这一切使得相对统一的主导性人文精神更难在短期内得以确立。

从上述两个层面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社会转型和现代化的特殊历史定位及其文化冲突将深远地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各方面乃至它的最终命运。从这一根本点出发，中国的发展哲学应当善于调整和修正其对中国社会转型和现代化的期望值不要期待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会是一个毫无争议、一跳而就的进程不要期待可以对民众进行一种一呼百应的现代人文精神启蒙。必须看到，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现代性的生成将是痛苦的、曲折的、缓慢的进程。

换言之，中国的发展哲学不可能简单重复西方工业化初期启蒙理论的角色，而必须依据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定位来确立自己的期望值和地位。对此我们不可能详细展开，而只能指出两个要点。一方面，它应当尽可能地减少不同文化精神之间的张力和冲突，尽可能地引导社会确立一种主导价值，把现代性的生成理性化和个体化当成压倒其他一切的首选价值，以防止中国的现代化因为乏力而搁浅或因价值导向倒错而前功尽弃另一方面，它应该引导处于社会边缘状态的人文精神回归生活世界，通过现实生活方式的变迁而不是观念的教化重建精英话语和大众话语的联姻，使新的生活方式直接冲击和触动生活世界的根基，从人们的基本生存模式中引出现代性的维度，因为微观层面上人由自在自发的主体向自由自觉的主体的转变才是社会转型和现代化的核心和宗旨。

[存档文本](#)